

曾经烽火战仇讎，稚气孩童已白头。

今日长征新路上，同挥彩笔写神州。

杨应彬

（原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 ● 郑黎亚

### 难 忘 的 一 百 天

编者按：广州市儿童剧团指导员郑黎亚，参加了剧团成立 63 周年活动。她认为荔湾区收集儿童剧团史料，让团史面貌更真实，更完整地保存下来，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大事。当大家尊称她为指导员时，她深情地再三强调：与其说是我去指导孩子们，不如说我受到了儿童剧团的教育并深受感动。当年广州儿童剧团在柳州期间，她受地下党委托担任指导员，与孩子共同生活、学习、工作了 3 个月，是她 6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最独特的经历。她认为当年全国上下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抗日救亡的文艺组织也有不少，但以儿童为主的并不多见，像广州儿童剧团上过前线，下过监狱，饱受磨难的更是绝无仅有。她很有感慨地说：“在撰写广州地方志时，我坚持要把儿童剧团写进去，十一二岁的孩子为了抗日，为了救国而上前线、坐牢，这一段历史绝不该让它湮没。”

下面是郑黎亚同志的回忆。

抗战初期，我在中共特别支部领导下的战地服务队，在武汉外围搞战地工作。1939 年到韶关后曾被分配到惠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及韶关游击干部训练班搞政治思想工作。1940 年春当我和杨应彬、朱河康、吉联抗等同志从韶关到达柳州时，我们的战

时工作队早已到宾阳、上林前线去工作了。我本来想马上赶到队里去，谁知第二天特支的领导人左洪涛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广州儿童剧团去工作。他说广州儿童剧团是个进步团体，刚从桂林到柳州。据了解，那里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因此派我去当政治指导员。我不太愿意去，主要是从没有搞过儿童工作，且又没有唱歌、演戏、跳舞的专长。左洪涛同志说，他们那里已经有艺术指导员，但缺少政治指导员，派你去当政治指导员是组织决定。我只好服从。临走时，朱河康同志对我说，这是临时工作，组织关系不转去，要我以一个进步青年的面目去开展工作。

广州儿童剧团的团长叫谈星，当时组织上并没有告诉我谈星是党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抗战前夕，他在广州一间小学当校长。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他组织了一批小学生成立广州儿童剧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他就带领儿童剧团离开广州到英德、韶关一带开展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该团有20多人，现在能记得名字的有海风、叶里、杨红、金峰、夏扬、乔飞、伊宁、谭明、白桦、路琪、殷虹、丁文、徐力等人。最大的15岁，最小的才11岁。另有3个青年人当艺术指导员。

我进团后不久，剧团决定到迁江、宾阳一带前线去演出。在行军途中，杨红、叶里、伊宁、谭明等孩子主动给我介绍情况，从他们的言语中，我感到这些孩子不但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他们毕竟还是孩子，当工作告一段落时或晚上睡觉前，总有一两个女孩子因为想家而哭。但只要我给他们讲故事，讲抗战必胜的道理，他们又破涕为笑了。我们每到一个驻地都是打地铺的；男孩子们睡在我的左边，女孩子们睡在我的右边。他们都叫我郑大姐，我也就像大姐姐似的和他们工作生活在一起，我在艺术上对他们没有什么帮助，但在学习上、生活上、思想上，却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因此他们愿意接

近我，和我谈。我除了给他们讲抗战故事外，还给他们上政治课 主要讲《论持久战》、《游击战》、《论新民主主义》等。

这个团没有固定的经费，靠演出维持生活，这次到前线主要是为各部队演出。舞蹈有海军舞、收割舞、儿童舞等，歌咏唱歌主要是唱抗战歌曲，还演出一些独幕话剧。孩子们从新安旅行团那里学到一些节目，自己也编写一些。演出这些节目，对宣传抗战到底，鼓舞士气起了一定的作用。国民党官兵们看到这些小孩子到前线来为他们演出时，很受感动，也增强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

孩子们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到一个部队演出，就由师部拨一点粮和钱作为招待的伙食，招待得好，吃得好些，招待得不好，连菜也没有，就用盐水送白饭。孩子们轮流值班买菜煮饭，轮到值班时，天没亮就要起床。剧团最小的叶里才 11 岁，矮胖矮胖的背着一个行军锅，行军锅的直径差不多有他高，够他受的，但他从不叫苦，和哥哥姐姐们一样，非常认真地为全团做好三餐饭。在这么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除经常排练和演出，孩子们还抓紧时间看书学习。

剧团在前线演出约三个月就回到柳州，战时工作队也从前线回来了。我就离开了孩子们，回到战时工作队。这时正值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国民党把许多进步的群众团体宣布解散，政治部最先提出要解散儿童剧团。谈星他们经过讨论，决定把队伍带回广东。国民党七战区的余汉谋比较反动，当儿童剧团在韶关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下令把全团人员逮捕了。我们在柳州听到这个消息后，左洪涛、何家槐等同志曾设法通过李济深去营救，但毫无结果。

我在广州儿童剧团度过了难忘的一百多天，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被捕后，我时常怀念着他们。 1944 年秋，有一天叶里和殷虹、丁文跑到柳州窑埠街实验小学来找我。我见到

他们后高兴极了。他们告诉我，趁日寇进犯衡阳时，他们从监狱里逃跑出来了。他们又详细地给我讲了他们当时被捕的情况以及在狱中斗争的情况，我顿时感觉到在面前的叶里和殷虹已经不是孩子了，他们小小的年纪，为了挽救苦难的祖国，不怕流血牺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把他们安顿好以后就向支部作了汇报。支部决定要保护他们，并及早地帮助他们撤退到后方重庆去。我按照支部的决定一一办妥，后来叶里从重庆去了延安，殷虹进了育才学校。不久谭明、路琪也到了重庆工作。1947年我从国民党地区撤退到香港时，谭明也从重庆到了香港。她见到我时好像见到亲人一样，激动不已，并马上向我提出入党要求。我认为她经过严格的考验，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当时我任港九妇联的支部书记，我把这情况向支部作了汇报，支部同意我介绍谭明入党。在谭明进行入党宣誓仪式时，我又情不自禁地想念着儿童剧团的其他孩子们，孩子们给我的鼓励和教育是永远难忘的。可喜的是，他们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正在不断地成长。

● 叶 华

## 广州儿童剧团战斗历程

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希望孩子们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创造新中国。以“革命、救国、创造”的精神武装起来进行工作。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广州儿童剧团，正是以这种精神，冒着日寇炸弹、炮火的危险，顶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迫害，忍着贫穷与疾病的侵袭，在城镇农村的群众之中，播下了抗日、民主、进步的种子，发挥了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的作用。

广州儿童剧团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文艺宣传队伍，自 1937 年 9 月 18 日建团，至 1943 年 11 月 26 日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集体被捕入狱为止，在广东的西江、北江一带和广西全省各地区转战整整六年。下面是我团六年奋战的简单历程。

### 一、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1937 年 9 月 18 日至 1938 年 11 月)

1937 年 7 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我国的大规模进攻，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展开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广州，抗日民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9 月 18 日在市立第 54 小学（现梯云路小学）礼堂里，一群天真的孩子举起了小拳头，在

老师谈星（何承蔚）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儿童抗日救亡文艺宣传队伍——广州儿童剧团。团员有 130 多人，大都是黄沙、逢源、陈塘等区的小学生，年纪最大的 14 岁，最小的只有 9 岁。团长谈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也只有 21 岁。

剧团成立后，我们在广州市和郊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演出抗日话剧《打日本》、《仁丹胡子》、《放下你的鞭子》等 每周到广播电台播唱抗战歌曲；同广州艺协、锋社、蓝白剧团、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联合演出和义卖献金，为华北抗日军民捐募寒衣和药品。当日军持续轰炸广州、学校停课的情况下，剧团为适应战时需要，开办了平民夜校和儿童识字班，并通过来学习的小朋友回去向他们的家长、亲友和小朋友们进行抗日宣传。

1938 年，“七·七”抗战周年纪念，广州市掀起了规模浩大的献金运动，支援前线。团长谈星更是日以继夜地辛勤奔波，领导我们联系各区儿童进行工作。同时，为纪念“八·一三”、“九·一八”和我团成立一周年，我们赶排了四幕六场儿童剧《古庙钟声》（许幸之作）、《海葬》，在太平戏院公演。同年 10 月中旬，全市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决心“誓死保卫大华南”、“保卫大广州”。蒋介石却推行对日节节退让的政策，促使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迫降，集中兵力南下，在大亚湾登陆，向广州推进。广州危急，广东省政府为了应急，成立了动员民众委员会，动员委员会组织战时工作大队，分赴各地城镇农村开展工作。中共党组织指示各进步团体争取参加，领取经费，随队活动，见机行事。我们团和“上海八·一三歌咏队”、“广州蓝白剧团”共同组成战时工作第五大队，准备向广西梧州方向撤退。撤退前，谈星团长召集愿随团西撤的团员去哥伦布餐厅，参加廖承志同志召集文艺界进步人士的紧急会议。他作了（当前抗日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明确了我们今后工作的方向。由于时间仓促，来得及集中的

我团同志仅有 22 人。10 月 21 日，广州沦陷的当天上午，我们冒着敌机的轰炸，高唱着“中国不会亡……”的歌曲，告别了抚育我们成长的家乡——广州。从此，我们便离开了舒适的家庭、慈爱的父母，凭着一颗爱国赤诚的心，在漫长的流浪生活中，坚持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战时儿童运动的组织工作。

我们和难民一起撤离广州。火车到三水附近，因日机轰炸，前面铁路已被敌人破坏，我们只好顶风冒雨，忍饥受寒，露宿公路、码头，徒步沿西江北撤，每天行走十几小时。某日深夜两点，大家又饥又困，一个个倒在公路旁就睡着了。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剧团仍然坚持抗日宣传。路上遇到伤兵、难民、乡亲们聚集的地方，便立即放下背包，拿起道具，敲起锣鼓，就地演出和教唱救亡歌曲。由于我们是从战区来的少年儿童，现身说法演得真切感人，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有的观众和学校师生自动协助我团工作，并表示也要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我们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行列教唱《救亡进行曲》和在军队中动员士兵枪口对外，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教唱《救国军歌》，两首歌都在学生、士兵和广大民众中传播。

我们在战火洗礼中迅速成长，很快就像大人一样能够独立料理自己的生活，还把同情和关怀送到难民和伤病员之中，尽心细致为他们服务，给他们送茶水，缝补衣服和寄家信等。遇到环境十分艰苦时，我们就高唱《少年进行曲》共勉：“少年！少年！新中国的少年，不怕苦，不怕敌人的凶残。我们在抗战中成长，一切都为了抗战”。这雄壮高昂的歌声，传遍城乡，响彻云霄。

## 二、转战广西各地

(1938 年 11 月至 1943 年 1 月)

在广西四年多的时间里，剧团先后到过桂东、桂西南和桂北大小城镇乡村，以及迁江、宾阳、上林、武鸣一带前线，开展各

项救亡宣传活动，同时还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增强持久抗战必胜的信心。

我们战时工作政工第五大队是 11 月初到达广西梧州的。在梧州，我们和当地文化教育界人士联合发起“抗日救亡歌咏宣传周”，在街头、十字路口、学校、娱乐场所，设置宣讲台、点，教唱革命歌曲；刷写抗日大标语；组织漫画巡回展；并展出宣传抗战，揭露日军侵略暴行的大型图文并茂的壁报等，把普及爱国救亡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家喻户晓。活动一段时间后，我们于 11 月底到达柳州。

在柳州，我团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12 月，广东省民众动员委员会宣布停止供给经费，战工第五大队只好解散。为此，我们三个艺术团体组织了一次筹款演出，上演了《扬子江暴风雨》、《塞上风云》。演出后，他们留给我团一点钱，就先后离开柳州。从此，我团就没有固定经济收入，完全要靠“自力更生”了。大家一时陷入彷徨之中，不知小小的儿童剧团，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团长谈星及时给我们分析形势，权衡利弊，并且满怀信心地讲述了我们可以坚持下去的各种有利条件，特别强调广大少年儿童十分需要我们多方面开展宣传教育、组织工作。思想明确了，我们很快又振奋了起来。决心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渡过难关。我们在柳州河南、河北两岸演出街头剧，展出流动漫画、大型墙报等，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和汉奸汪精卫卖国求荣的言行，激发群众同仇敌忾挽救民族危亡的意识。为了纪念抗战两周年，我们还参加了推销进步书籍和抗战歌曲选集，举办篮球义赛、歌咏比赛，在全市各界歌咏比赛中，我团获得了第一名。这些活动对当时当地的救亡戏剧开展和儿童活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团应邀到广西农学院演出。我们的演出纯朴动人，感染力强，有很好的宣传效果，深深感动了学院的教授和广大师生，他们看到我们十分清贫，纷纷自动捐钱、捐衣被给我们。

这之后，我们又接到在融县的“四一”兵工厂的邀请。在我们准备离开柳州赴融县演出的当天，1939年4月16日（柳州日报）曾评说：“广州儿童团抵柳数月，工作异常努力，对于儿童救亡运动推动尤为积极，最近该团演出《古庙钟声》，招待本市儿童及各界民众团体，情形甚为热烈。……”

“四一”兵工厂的前身是广州石井兵工厂，工人们迁到广西的深山僻野之后，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加上敌人、汉奸从中破坏，想尽办法企图骗工人回广州沦陷区工作，工作情绪不大稳定。看了我们这些从家乡来的孩子，充满爱国热情的演出之后，他们深深感动，纷纷到后台邀我们到宿舍去玩。工人们围着我们问寒问暖，并提出不少疑问。他们问团长：“你是个大大学生，哪里不能寻个好生活，为什么挑这份担子，既没有薪水，剧团又没有政府给经费，不是自找苦吃吗？”又问我们：“你们小小年纪，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图的是什么呢？”团长诚恳地回答说：“我何尝不想安安定定教我的书呀！可是不行呀，日本鬼子一连数月疯狂轰炸广州，学校都停课了，现在又占领了广州，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才带领这些学生出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团员海风接着说：“这都是日本鬼子迫的呀！”一位工程师拉着我的手问：“你的父母呢？想家吗？”我说：“我的父母在广州，现在不知去向，也不知死活，我很想他们，也很为他们担心。但我更恨日本鬼子，我宁愿流浪也不当亡国奴。”那位工程师说：“对！有志气！我也不回去。”经过谈心，我们和工人的心贴得更近了。针对工人的现实思想，团长赶写了剧本《爸爸不要做汉奸！》，排练演出后，收到良好效果，不少工人激动得流下了泪。当我们演出任务结束，准备离厂时，职工们再三挽留，要和我们联欢。我们答应留下后，职工们活跃了，老职工也登台演唱粤剧。他们的锣鼓、行头、布幕、道具都有一整套的。原来，在广州时，厂里的业余粤剧是经常演出的。这一次，我们和工友们同台演出。至深

夜才散。第二天，工程师领我们参观他们制造的各种武器，让我们最高兴的是，每人都打了步枪和机关枪。老师傅们还给我们每个人一架铜制的小飞机模型，希望我们长大成为捍卫祖国蓝天的战士。第三天上午，当我们离开兵工厂，已经跑了三四十里路时，几位工友挑着衣物、棉被、草帽，带着现款，追了上来，说这是全厂职工的一点心意，一定要团长收下。工友们的深情厚谊，使我们受到了鼓舞和教育。

离开融县，我们进入桂西北边远的长安、百寿。这里的群众是第一次看到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感到新鲜、亲切，很自然的接受了我们宣传的道理。我们还帮助两地的学校，分别建立了战时儿童工作团，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活跃了当地的抗日爱国活动。

1939年6月，我们开始翻越桂北有名的高山峻岭“苦马岭”和“三大炮”，准备奔赴桂林。当我们艰难地攀上山顶时，我靠在供人歇脚的凉亭圆柱旁，回首眺望走过的大小山头，一种无比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谈大哥走过来问：“你看什么呢？”我指着下面的山头高兴地说：“它们都被我们征服了。”谈大哥招呼大家：“快来看一看这‘一览众山小’的难得看到的风光。”海风看着山下，也深有感慨地说：“现在更理解登山途中谈大哥一再鼓励我们，坚持就是胜利的意义了。”

19日，我们经过一周的时间，经受了“苦马岭”和“三大炮”的严峻考验，徒步600多里，终于到达了桂林东安镇小学驻地，受到了住在这里的“新安旅行团”的同志们和汪达之顾问的热烈欢迎。

在广西四年多，特别是在桂林的九个多月（1939年6月至1940年3月底）是我团重要的发展时期。当时的桂林，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关怀指导下，利用广西地方势力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与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矛盾，

使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它吸引了大批从上海、武汉、广州、香港各地沦陷区和广大后方迁移来的进步文化界、戏剧界、音乐界、美术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欧阳予倩、司马文森、邵荃麟、马彦祥、焦菊隐、熊佛西、洪森、周钢鸣、范长江、金钟华等。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桂林的儿童抗日救亡运动也蓬勃发展，组织了一个“桂林儿童团体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属下的各儿童团体代表，还为我团举行了欢迎会。我们也参加了桂林儿童团体工作座谈会，从此，和各地来桂和在桂林的儿童团体一起研究、交流经验、计划部署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发动全国少年儿童给前方抗日将士写慰问信、寄慰问袋，发动少年儿童节约零用钱“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为抗日战争中死亡的少年儿童树纪念碑等。

对我团来桂后的情况，当时 1939 年 6 月 24 日（广西日报）报道说：“桂林儿童工作座谈会，昨日开会欢迎广州儿童剧团，……一群小战士欢聚一堂，甚为热烈。首由新安旅行团黄健芬主席致欢迎词后，即请广州儿童剧团谈星团长报告在广州工作情况及来桂经过，言词中充满着该团在万难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听者深为感动，最后并共同提议，由各儿童团体帮助该儿童团日常生活所需，以尽友谊。闻广州儿童剧团亦此次备受桂林各界热烈欢迎及帮助深为感激，特于今明两晚在省府大礼堂公演话剧招待各儿童团体，明晚招待各界人士以谢盛意。”又讯：“在艰苦奋斗中走遍了华南各地之广州儿童剧团，已于日前步行抵桂，备受本市儿童团体及各界热烈欢迎。该团抵桂后工作甚为紧张。前晚应广播电台之请，前往播送抗战新歌，所播之曲，计有二部及四部合唱甚多，歌声雄壮，颇得各界好评。广州儿童剧团是个民众团体，一直靠自筹经费，坚持抗日戏剧工作，而两年来没有政府经

费资助，数月前为了工作需要深入桂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宣传，收入甚微，到桂后贫困得揭不开锅了。”此外，《广西日报》还报道了桂林儿童团体工作座谈会各儿童团体援助我团的情况。

在桂林，我团和参加桂林儿童工作座谈会的儿童团体一起，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举办了儿童运动问题座谈会，研究如何团结全国儿童为抗战工作，并着重讨论了怎样开展中国儿童运动，全国儿童团体如何联系问题。这是中国儿童运动史上一次有意义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我团外，有新安旅行团、厦门儿童剧团，长沙、育英儿童工作团等团体，以及新旅的顾问汪达之，生活教育社程今吾、季平、《少年战线》陆洛等，这时座谈会的团体会员已达 8000 多人。为了交流各地儿童抗日斗争经验，座谈会出版了抗日儿童刊物《抗战儿童》、《少年战线》。

在桂林期间，可说是我团的黄金时期；有了个固定住处，吃饭有保障，比较安定。谈星团长决心借助桂林的好环境，加强剧团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从政治、艺术、文化知识等方面充实全团同志，引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学习洛甫的《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读进步小说如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还有《铁流》、《夏伯阳》及《西行漫记》启发我们树立革命人生观。谈星团长还很注意对我们进行时事和形势教育，使我们对抗日形势和中国的前途，有清醒的认识。团长请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范长江、金仲华、欧阳予倩、周钢鸣等来团做报告，讲解抗战文艺方针及国际时事，通过上述这些工作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政治觉悟，加强了团结。在组织建设方面，团长借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新旅”的经验，在团内成立了团务委员会，分政治、文艺、歌舞、戏剧等几个小组，还制定了各种学习、工作、生活制度。如规定我们写日记、读书笔记，召开民主生活会和轮流值日，主持日常活动的民主管理制度等，使我们的内部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1939 年底至 1940 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桂合流，广西政治形势随即恶化。广西反动当局贯彻国民党中央《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明令取缔“桂林儿童团体工作座谈会”。厦门儿童剧团被解散，新安旅行团秘密转移，我团也面临着解散的危险，政治、经济处境都十分艰难。谈星团长沉着应战，连夜赶写了《桂林九月》，刊登在《广西日报》上，鸣谢各界对我团来桂后给予的种种支持和帮助，说这一切都是在省政府黄旭初主席关怀指导下进行的。文章最后开列了一串帮助过我团的知名人士的名单，左、中、右方面的人物都有。又在（力报）上刊登了一条小消息：广州儿童剧团将离桂，返回广东省会曲江工作。团长这样做的目的是迷惑和震住小特务们，使他们一时不敢前来和我们捣乱，与此同时，我们急忙离开桂林，转向中小城市、前线、农村。四月初，返回柳州。团长通过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司令的秘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左洪涛同志，为我们争取到由司令部特约三个月到前线部队去工作的机会。团长考虑一般特约工作，司令部政治部都会派人来我团指导，而四战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很反动，于是争取主动，及早找左洪涛同志商量对策。左洪涛立即派了青年女地下党员郑黎亚同志，来我团任指导员。她和我们一起上了前线。这期间她给我们讲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还给我们讲故事，和我们谈心，我们都叫她郑大姐。

我们去的是桂东南前线红水河畔，迁江、宾阳、上林、武鸣一带。我们深入连队，除演出外，还为战士讲解持久抗战的正确方向，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一带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老乡们对军队不太了解，我们挨门逐户访问，宣传军民一致抗日的道理，加强了军民团结。我们坚持一个个部队、一个个村庄巡回演出。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并组织了迁江战时失学儿童识字班，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了战士和乡民的亲切欢迎。六月

底，正当我们在宾阳前线紧张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长官司令部的通知，要我们立即返回柳州。听到我们要走的消息，士兵和老乡都恋恋不舍，老乡们送给我们一面绣有“为民先锋”的锦旗，士兵们把缴获的日军指挥刀、钢盔送给我们做演戏的道具。

回到柳州的当天，我们的郑大姐就回到她的原单位去了。第二天，张发奎司令召集我们说：“抗战是大人的事，你们小小年纪，应该去读书才有前途，我送你们去读书好了。团长、指导员可以到司令部任职。”我们一听全都愣住了，这不是要解散广州儿童剧团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吭声。稍后，还是团长机智地回复了他。团长说：“团员们都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儿童，他们父母姐妹还在沦陷区遭受当亡国奴的灾难，去留问题要由大家拿主意。”张发奎只好答应让我们讨论后回复他。从司令部回来以后，团长引导我们讨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工作和学习的关系？什么是个人前途？大家回顾两年来在抗日救亡工作中得到的锻炼，一致认为，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只要国家有前途，个人才有前途。甘愿继续坚持抗日宣传工作，边工作边学习，在抗战中成长。由于全团团结一致的斗争，剧团避免了再一次被解散的危险。

7月，剧团离开柳州，转向桂平、贵县、郁南一带巡回演出。排演了《排色网》、《风波亭》、《结婚进行曲》、《松花江上》等舞台剧，受到观众的好评。这一时期，我们不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刁难、捣乱，国民党地方官员要事前检查我们演出的剧本内容，严令删改剧本台词等横蛮作法，甚至禁止上演。团长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派日益加紧迫害进步人士和解散进步团体，叮嘱我们言行要特别谨慎。要求全团把工作重心放在“播下革命种子，壮大基层民众救亡组织”上面。这期间我们的工作比以前更加扎实和深入了。剧团先后组织了梧州、柳州、融县、长安、迁

江儿童歌咏队等。还通过进步关系，在桂平《寻州日报》争取到副刊的一个版面，定期出版《桂平儿童》。

11月，我们进入日军刚刚撤出的南宁城。劫后的南宁，荒凉破败，满目疮痍，政府机关尚未重建。日军占领时间长，后期实行“怀柔政策”，对南宁民众，特别是儿童毒害很深。团长组织我们讨论如何投入南宁的重建工作。有的说，看到满街都是“东亚共荣”、“日中亲善”、“建设皇道乐土”等反动标语，真是气死人，应该刷上新标语。有的说，看到许多失学儿童，口里哼着日本歌，心里真难受，要赶快让他们上学。于是大家分头行动，一部分人刷写新标语，一部分人去家庭访问，了解儿童受奴化教育情况和学习要求。根据调查情况，团长决定以自己力量创办一所新型小学——南宁抗战建国实验小学。团长从八路军办事处得到陕甘宁边区学校的课本，结合南宁的情况编写教材。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唤起学生的爱国观念，唤起学生的抗战意识。

“实小”免费招收学生，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有300多人入学。“实小”兴办不久，入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引起了国民党市党部、教育局的注意，他们散布我们搞赤化教育的流言，并派流氓来捣乱，先生、学生都不时遭到殴打。

1941年9月18日，我团举行了建团四周年纪念大会，提出了“继续四年来艰苦奋斗的精神，迎接光辉灿烂的第五年”的战斗口号。会上发了新团章，并全体合影留念。这幅照片是我们全团唯一的一张最珍贵的团体照片。不久，反动派就以我们没有校舍，没有办学基金等为理由，勒令停办。我团对此早有准备，早在暑期时，就带领高年级学生下乡宣传实习，培养了一批骨干，成立了南宁儿童歌咏团。1942年1月，我团被迫离开南宁，沿西江东下经梧州回到广东肇庆，结束了辗转广西四年多的生活，告别了在码头上恋恋不舍地欢送我们的实验小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告别了哺育我们成长，印满我们匆忙的脚印，洒满我们

辛勤汗水的第二故乡——广西秀丽的山山水水。我们走了，但我们一路播下的革命种子 仍然在坚持抗日宣传工作。

### 三、在肇庆的艰苦岁月和狱中斗争

(1943 年 2 月至 1945 年 6 月)

肇庆在西江上游，交通十分方便。这里是粮、油、麻、桐油、药材等土特产的集散地，也是走私商人往来广州、香港，把军需民用的物资偷运资敌，乘机发国难财的货物储运基地。这里贫富悬殊，一方面是土豪地主劣绅官僚党棍与奸商的世界；一方面是四乡灾民聚集、民不聊生，横尸街头，甚至出现买卖人口的市场。当时我们既要向这些有钱人募捐，支援前线。又要跟他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作斗争。经团务会议研究，同他们相处，原则不能丢，既要讲统战，又要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而斗争。宣传要有针对性。我们排演了痛斥奸商的《国难财》、《你这个坏东西》、《走私的人》等节目 演出时 把前几排好座位的高价票向奸商们推销，他们为了得个“爱国”的招牌，很高兴地买了“荣誉券”来看戏。可是节目开始后，舞台上连声痛骂奸商害人又害己，他们明知是骂自己，可又不好不硬着头皮看下去，因为自己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只好哑子吃黄连。虽然，一两个节目改变不了奸商们唯利是图的本性，但是却为广大人民伸张了正义，起到了团结壮大爱国力量的作用。

当时，我们的剧团是在经济十分困难，政治迫害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坚持演出的。我们住在肇庆市中山纪念堂的礼堂里，睡舞台地板，盖的是布幕，吃的是碎米和发霉的陈仓米，后来连这样的平价米也买不起了，只能吃黑豆、芋头或红薯度日。那些一心想搞垮我们剧团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从演出节目中抓不到我们的辫子，就改由经济上来卡我们。他们指令三青团出面，出高价迫戏院老板改变租约，强行顶包我们准备演出的戏院，使我们不